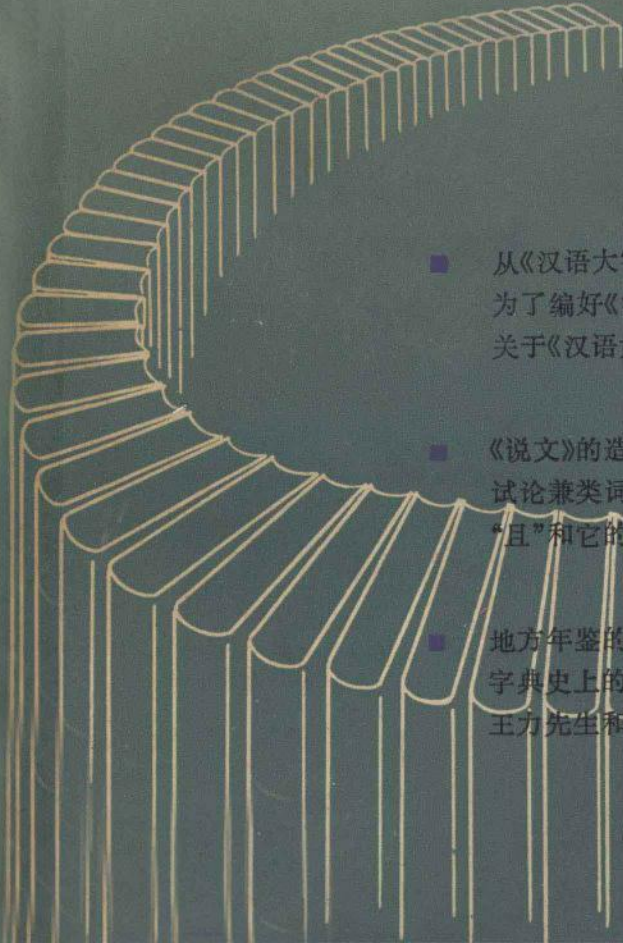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 
- 从《汉语大字典》编撰中得到的教益
为了编好《汉语大字典》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
 - 《说文》的造意
试论兼类词的义项建立原则
“且”和它的同源词释证
 - 地方年鉴的研究和编纂
字典史上的一块丰碑——《四声篇海》
王力先生和他的辞书理论与实践

辞书研究

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总第四十一期)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二八六号

定价五角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四五七号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辑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辞书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七年一月

I	祝贺《汉语大字典》的出版
	· 祝贺《汉语大字典》首卷出版 · 2 许力以 从《汉语大字典》编撰中得到的教益 7 李格非 为了编好《汉语大字典》 13 赵振铎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 17 张在德 《汉语大字典》的特点 22 左大成 《汉语大字典》的收字问题 27 汪耀楠 《汉语大字典》对清以来训诂成果的利用 33 伍宗文 《汉语大字典》的“通” 40 鄢先觉 《汉语大字典》的名物字释义 49 周炳森 《汉语大字典》编写器物字的要求和作法 54 冯书华 《汉语大字典》的字头编排
	· 我和词典 · 57 李承节 略谈对辞书的收集与利用 59 应国靖 辞典，无言的老师 62 李国英 《说文》的造意 ——兼论辞书对《说文》训释材料的采用 71 陆福庆 试论兼类词的义项建立原则 77 甘于恩 试论语文词典对自由词组的收录 85 陆宗达 “且”和它的同源词释证 91 冯 利 “社”字义变与词义演变的文献证据 94 常 政 地方年鉴的研究和编纂 102 张一德 法语词典学的回顾及展望

· 杂 谈 ·

- 112 徐祖友 词典要有个性
114 赵思柱 从《辞海》获奖想到……
116 翼 群 丰收与耕耘

- 118 张履祥等《吴下谚联》——别具一格的吴语谚俗词典
124 忌 浮 字典史上的一块丰碑——《四声篇海》
131 朱建颂 古方音韵书——《字音会集》

· 人 物 志 ·

- 137 施光亨 王力先生和他的辞书理论与实践

· 编写一得 ·

- 145 杨宗义 《汉语大字典》编辑二三事

· 释义探讨 ·

- 149 骆宾基 释“𪔐”

· 资 料 ·

- 151 李 鉴 1985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续四)

· 新词新义小集 ·

- 155 [土政策][公平秤][四二一综合症][卖大户]
[组建][药具][紧缺][打牌][退役]

补
白

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在穗举行(6) 全国地方性年鉴编纂座谈会在上海举行(117) 上海高校招收词典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2) “合拱”到底指什么?(32) “民兵”一词的溯源(111)

短论

祝贺《汉语大字典》的出版

一九八六年的第四季度，体现社会主义中国语文学术水平新高度的《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这两部大辞书的先后开始出版，是中国辞书事业雄迈发展到达一个新里程的坚定而岸然的丰碑，当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正在我们全社会的规模上产生强大作用的时候，作为文化建设基本工程重大构成部分的这两部大辞书的开始出版发行，更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辞书界特别为之欢欣、引以自豪并从而大受鼓舞，是十分自然的。

人们知道，清代鼎盛时期有《康熙字典》，辛亥革命后不久有《中华大字典》，不同的历史时期编出各自的大字典，那么，社会主义时期理所当然地应该编出大大超过前人的大字典。三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开始有了《汉语大字典》。如果从《康熙字典》成书的1716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二百余年间中国出了两部大字典；那么，建国三十七年后开始出版《汉语大字典》，当然是值得欢呼的。《汉语大字典》的内容和形式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诸种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一样，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也是战胜了相当长期的“左”的思潮及其影响的困扰的一种表现。

当然，从《汉语大字典》的开始出版，到全部出齐，还有一段艰巨的路程。在未来的几年里，即在全书出齐的过程中，还会有各样可以想象的工作上的困难。然而第一卷已经出版了，开头的万事难已经过去，我们坚信，往后的困难，定能逐一克服，并使往下各卷的质量更见提高，更见完美。

我们还相信，在《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出版过程中，我们的辞书界必有众多各种类型的辞书编纂和出版，奉献给在现代化建设中日见进展的我们的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祝贺《汉语大字典》首卷出版



从《汉语大字典》编撰中得到的教益

《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力以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解释和阐述的大型辞书。这部辞书集汉语言文字研究之精粹，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点项目。

《汉语大字典》从1975年开始编撰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十一年。这十一年编者何等艰难，真可说是耗尽心血，流尽汗水。《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是姐妹篇，有人说是难兄难弟。这两部大辞书的经历大体相同，都有一番艰辛。现在这两部大辞典同时出版了，十一年怀胎，产下孪生巨子，值得庆贺！在我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这两部辞典的编撰出版，也会立下值得纪念的碑记吧！

1975年夏天，来自全国出版界代表一百多人在广州东方宾馆聚会，讨论制定一个全国的辞书编撰规划。当时大家都觉得《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规模宏大，任务繁重，特别是鉴于当时的条件，单独由一家承担这样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会上讨论来讨论去，你看

我，我看你，都觉得不好承担。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出来说：《汉语大字典》如果没有别人承担，交

给湖北如何？这位负责同志和省里联系，长途电话往返多次，终于又联络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共同承担，这样任务就确定下来了。《汉语大词典》也是这样，由上海的同志倡议，华东几省市合作，共同承担。至此，规划落实了下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批准了广州会议制定的辞典出版规划。这个规划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现在各种词典的陆续出版，包括汉语词典和多种双语词典的出版，都在这个规划之中。

《汉语大字典》长达八卷，汉语言文字古今纵贯。在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有些什么启示和教益呢？

一、编撰人员的选择。这是出版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编撰者选择得当，出书就有希望。《汉语大字典》动员了湖北、四川两省十多所有声望的大专院校中文系老师，参加工作的老师又经过挑选。主持大事的是几位教授、副教授，他们在国内外有影响，在汉语言文字方面有相当的研究。这支队伍的骨干有一百多人。《汉语大字典》依靠这些同志来工作是得当的。虽然在组织队伍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插曲，例如开始搞资料工作的阶段，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适当地组织过部分不熟悉业务和缺少文化知识的人来参加工作。但这一段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从总的方面来看，《汉语大字典》的工作能顺利完成，是在于所组织的编撰队伍的得当。

二、领导的重视。如此复杂的工作和庞大的队伍，没有坚强的领导是不行的。这一工作从开始到现在，都依靠四川和湖北两省的省委来抓，特别是由两省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来负责组织。在工作过程中，两省的宣传部长经常过问编撰过程中的细节，包括人员的调配，工作的安排与协调，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等。这一工作如果没有省委宣传部来领导，工作难于开展。

四川、湖北两省为《汉语大字典》的编撰工作，曾联合向中央写过多次报告。国务院为加强辞典的编撰出版，专门发过两个文

件。中央宣传部也为大字典的工作作过多次批示。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时候，《汉语大字典》被列为规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中央领导同志对这部字典的编撰非常关怀。1979年11月，胡耀邦同志为这部大字典作了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进行。希望全体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在中央的关怀和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这部字典的重大原则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三、院校的支持。这部字典的编写人员，都在两省的大专院校内。在“文革”中，院校的老师无书可教，无事可做，“文革”以后教育事业逐年发展，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师越来越紧缺，如此众多的老师用长达十年时间脱产专攻大字典，学校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一工作如果没有学校的支持，没有地方和中央教育领导部门的支持，也是搞不下去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动员这样多有水平的教师来共同编撰一部大辞典，是不大可能的。

编撰《汉语大字典》，许多老师贯彻始终，他们不仅是十年八年，有的还要继续工作达到十四、五年，直到大字典最后一卷出版为止。老师们对这一工作呕心沥血，甚至有为工作积劳成疾，倒在书榻上辞世而去的同志。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

四、质量第一。辞书和一般书籍不同，要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甚至几个世纪后仍可查阅。例如前人留下来的《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仍然不愧为好的辞书。解放前编撰的《辞源》和《辞海》，也为中国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为世人所称道。我们现在编撰的《汉语大字典》，集中了有相当水平的人才，而现在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又有很大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完全能够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汉语字典。

高质量是这部字典编撰者的目标。每次召开编撰会议，提高质量的议程，都摆在重要的日程之内。现在字典收字五万六千个，是历史上收字最多的，而这五万六千字，又经过多次核定。对字的

形、音、义的注释，努力反映历史的源流和演变，同时注意了近年文物的最新发现，并吸取了现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部辞书的质量究竟如何，还有待于社会的评价和历史的考验。

五、人才的培养。在编撰大字典的过程中，由于工作的磨炼，大批人才得到培养。有同志开始时知识较浅，后来攻读文献，查阅资料，日积月累，知识逐渐广博，他们专心钻研，成为编撰字典的行家。不少同志在编撰中写有专著，有的对汉字进行历史的考察，调查了新发掘出来的古籍，深入研究，成为有成就的学者。《汉语大字典》的编撰，推动了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汉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开展，又促使人才的成长。

六、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字典编撰是从收集资料开始的。现在两省为编撰字典，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光是资料卡片已达六百万张。这是一宗宝贵的财富。资料是研究学问的基础，查阅资料又是非常麻烦的工作，现在积累下来的资料，如能有计划地编制程序输入电子计算机，今后修订大字典或编撰新的辞典，将会获益非浅。

七、财力和物资的保证。编撰出版这样规模宏大的字典，没有一定的财力与物资的保证是办不成的。湖北、四川两省出版社耗资百万，如果不是两省财政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支持，在长时间没有收益和弥补的情况下，是难以支撑的。这部字典和别的字典不同，排字要求用繁体字，书中有复杂的文字形体，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到楷书都有反映，这就需要有繁多的字模和其他技术配备，这些设备都是需要资金的。为了准备印制这部字典，还要装备印刷厂，国家出版局虽然拨给一定的专款，但也只是稍有补充。在印刷过程中，纸张与各种材料的储备，还需要一笔巨款，这些都要依靠四川、湖北两省予以保证。如此巨大工程，没有雄厚的财力与物资也是不成的。

八、团结合作。两个省合作一项目，队伍庞大，时间久长，

如果不精诚团结合作，事情就办不好。不说两省，同一机关两个单位也可能有矛盾。问题是要互相谅解，从大处着眼，不计较小节，共同为着一个目标。编撰大字典十一年以来，两省的合作团结相当好，特别是两省主管这方面工作的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提倡谦让，团结克己，对本省处处提出严格要求，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非常之好。这部字典出版如此顺利，也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的体现。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现在出版了，但是繁重的工作还在后头。在出版过程中，要严格要求，反复校阅，消灭差错，进一步提高质量。我们要一如既往，把后七卷工作努力做好。字典出版以后，还有修订的工作，修订工作的准备现在就要开始。要注意听取意见，收集材料。相信在两省同志们精诚团结合作之下，今后工作会做得更好。

1986年7月8日



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在穗举行

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黑龙江大学和广州外语学院共同发起的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0月23—29日在广州外语学院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等院校和五家出版社的四十余位代表与会。会议收到论文近三十篇，分别就俄汉词典编纂原则、词典评论与释义探索、俄汉词典的体系与规划等三个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会议期间，正在编纂出版中的《六国语文词典编纂研究》一书的作者、广州外语学院黄建华等五位同志分别介绍了法、俄、英、日、西班牙语诸国语文词典编纂概况。据了解，召开全国性的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翼 斌)

为了编好《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

李格非

正当我国各个学科、各种类型的辞书纷纷出版、盛况空前的时刻，《汉语大字典》第一卷出版了。其余七卷也将陆续出版发行。这是一件大喜事。对我来说，这却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全体同志十来年的劳动没有白费，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我们从无到有毕竟新编了一部大字典，没有辜负全国人民和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期望；忧的是，任务很重，要求很高，担心编写水平达不到标准，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任务，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和领导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具有四千年历史的汉字，变易孳乳，复杂异常，形、音、义千丝万缕的联系，纠葛万端。以我们四川、湖北两省的编写人力、条件，想把这部大字典编得比较完善，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接受任务时确实是诚惶诚恐。但在实践进程中，我们又从没有向困难低头。同志们忧心而不丧志，总是兢兢业业迎着困难前进，一面编写，一面学习，摸索积累经验，想把字典编得好一些。筹划伊始，我们只打算编出一部主要是静态描写的大字典，学术界有些专家却希望我们能尽量照顾汉语的历史发展。其实，这也是我们心所欲为而力有未逮、不敢贸然承担的重大任务。关于语文的历史研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要能了解本国语文的材料与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这告诉我们，要知道祖国语言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其由过去到现在的发展的内部规律，以期能对今后汉语言文字发展演变，起

到一定的规范作用。这个系统研究历史语言的原则要求，我们逐字编写字典的人，却很难完全达标。但我们编写《汉语大字典》，还是应当尽力之所及，逐字探索其源流演变，尽可能历史地和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变化，以期能在汉语言文字的系统历史研究上，做出我们一点一滴的贡献。

在字形方面，我们要求在楷书条目下，收列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并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的形体，并简述其结构和演变。这不止于说明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形体变迁，且更是通过对最早汉字形体结构的解释，进而了解其造字时的本义。这就是我们传统小学研究中“求本字、本义”的工作。甲骨文未出土以前，此项研究主要是以《说文解字》为依据。小学专家为之广收义证、说解形体，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甲骨文的准确辨识，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甲金文字与小篆，相与比勘研究，两方结论基本一致时，就可以说明文献资料与出土文字，两相验证，弥足徵信。其有两说互异者，则进一步徵诸卜辞、铭文，考之有关典籍。于是《说文解字》的某些历史局限也可以得到补证，古本字得以重新厘定，古本义得以还其本原：可谓正本清源，相得益彰。我们小学“求本字、本义”的研究，也将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可用更多理据，求出古本字造字时的意义。这就是字义发展的“源头活水”，溯源及流，顺理成章，历史脉络就清楚多了。

注音的原则是有重点地适当地反映汉字字音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分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三段标注。上古音只标韵部，中古音标出反切及其所表示的音韵地位，现代音用汉语拼音注明普通话的音读。原来只打算比照海内外大字典、词典的惯例，只标注中古反切和现代读音；后来考虑，为了最简略地照顾语音史发展全程，则上古音为音之渊源，不能不注。由于声、韵、调的分类研究结果，尚未臻统一，因将需要比较迫切的韵母分类，先标出来。声调、声母，暂付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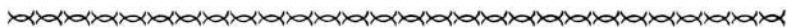
如,以待今后的研究成果。本来,上古、中古音,都可以在传统音韵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标出各该段的古音构拟音值。因为我们的古音重建研究,既有古音分类以及切韵系统缜密的分类研究的成果,又有广大方音系统的口语依据,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构拟古音音值,其可信程度是较大的。一个语言的诸方言的历史比较,其音系和音值方面总是比较接近,容易对应一些。这比单用历史比较方法就亲属语言的口语比较研究所得出的母语重建音值,当更为可靠一些。因为前者所研究的亲属语言对象,有些文献资料是比较少的,而我们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和韵书系统,先在古音分类研究基础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之所以没有反映构拟古音的成果,是照顾典范性的要求,在研究成果还没有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以前,我们不敢刊入字典。但当我们审音、定音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单纯依靠古音分类的系统去推演出现代的音读,而是在我们脑子里结合音韵分类体系还隐约地存在着古音构拟的雏型。这样,就有了古今实际音感的直接比较,同时又有系统的音变规律的规范指导,从而进行审音定音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得多。注音工作和字义辨析是紧相结合的。中古韵书,反切繁多,但我们主要是就具有辨义性的反切,建立音项,进行注音。汉字多音多义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有的一字多到八、九个音项,分别领属好几十个义项。这些音项、义项,现代普通话不可能一一都有反映。但也没有音、义合并的明显倾向。因此我们不能主观决定音、义分合,除有音变规律可为依据的某项音项予以合并外,其余只好一依韵书音切,分别建立音项,各自分领义项,这样还可以保持旧读痕迹,以供历史研究。那些不起辨义作用的又切与主切语,音、义全同,一般是略而不计;必要时,根据一定的条件,选取收列。凡属辨义音切,则不能轻易弃置,割断历史线索,有时就用附注“旧读”字样,以为志别。全书需要注音的字约计56,000个。除已有现代拼音注音的14,000~15,000字外,有40,000余字,主要是由

我们来审注现代读音。由于工作量大，错误可能很多，尤其是些特例字、难字难于处理，疏误可能更多，敬希批评指正。

字义部分是编写字书的重点。形、音、义三个方面虽分别编写，但以字义为中心，紧密地联系音、形，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我们的主攻对象。根据字形部分所立的本字、本义，由源及流以至引申义、比喻义、通假义等等，按照史序，结合音义，以绎述字义的演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作法。我们主要靠自己建设的一套资料卡片来进行编写工作。我们主要根据三证(例证、书证、疏证)资料，抓住字的中心意义，结合附带语义，以进行义项的概括。既要保证义项完备，涵义丰满，引申、譬喻可以理解；又要不流于随文释义、义项繁琐，互相牵缠；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发掘新的资料，辨析字义的微殊，概括词素的意义，有理有据地建立新的义项，以反映汉字字义的丰富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做过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此已有文章介绍，我不赘述。但面对四千年汉字字义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不能不望洋兴叹而深有所感。我们字典各个历史阶段的义项收列，不是平均发展，一律丰满，而总是畸多畸少，畸重畸轻，不很平衡，有的甚至付缺。为此，我们深感力有未逮，日夜不安。诚然，我国的文化遗产丰富，古籍浩如烟海，我们用手工建设的资料档案，实在很难按照史序全面供应，于质于量都难于保证；其次，汉语历史的研究，还不及在形、音、义各个方面普遍深入地展开；在某些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字源中断、义证孤贫的现象。当然，有一些资料，还可能埋藏在地下深处未被发掘出来，有的还可能混杂在汗牛充栋的古籍堆里，我们还没见到。由于这些先天性弱点和我们的计划未周、工作不力，我们在字典编纂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我们朝前看，从主流看，我国学术界的大好形势，对我们今后字典工作的不断改进，是大有帮助的。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所及，我们语言学各个部门的知识更新，

日益发展，汉语各个方面的历史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地深入展开，语言学与有关学科的互相结合，日益增强。无论是古籍整理的成果，学术资料的累积，尤其是新学科的开拓，都大大地超过了古人。例如语言研究工具的现代化改革，已经有了好的开端，语言自动处理编纂的资料索引，已经陆续有所发表，并将逐步发展到对古汉语资料的自动加工处理。这些，已经为语言研究的现代化拉开了序幕。又如考古学研究空前发展，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语文资料极为丰富，似乎是“字源中断”的资料，今天也有所发现，我们要凭藉这种学术发展的空前优势，从有关学科研究的丰富成果中，为大字典的各个历史阶段，尽可能地补充资料，为今后的补证工作作好准备。我们要比古代学者更加广泛深入地旁征博引，多方求证。进一步求之古籍的“三证”，求之出土资料、竹简帛书，求之古籍整理的新发现，求之文史研究的新成果。为什么如此强调资料和求证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呢？因为我们辨析文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都需要有丰富的资料以资论证。论证资料就是编好字典的坚实基础，资料丰富，一般的专业工作者可以编出较有特色的字、词典；如果资料异常贫乏，虽有专家，也不能为无米之炊！我们大字典征引专家学说时，也曾有若干不够谨严，论证资料不足，遽尔臆说臆断。这是编字典的大忌。因为语言文字是社会产物，是人们社会交际的工具。无论是对字的音义辨析或形体的考释，都必须为全民所共同理解、共同承认，才算是约定俗成，有了牢靠的社会基础。讨论某一字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规律问题，就必须带出该历史阶段的语文资料，以为验证。论证的资料越丰富，论证的结果就越精确。所以有无翔实的论证资料，是判断研究成果真伪的试金石。资料和观点，能否互相验证，能否引起读者的理解、共鸣，能否为全社会所接受、公认，这就是对我们字典成品有无科学价值的试金石。这些粗浅意见，是我从事字典工作的学习汇报。详细论述，同志们各有专论。我们编字典的同志，

都是坚持一面认真编写，一面虚心学习。学习顾问专家的理论著述和有关理论知识，学习海内外字、词书的先进经验。在大字典内部，两省同志，团结一心，互相学习。我个人要坚持不断地向两省全体同志学，要学习同志们的学术心得和编审经验。总之，我们要从字典工作的需要出发，不断地学习新知，为我所用。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新创建，但新的探索，起于跬步，每每又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和错误。总望海内外专家、读者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所匡正，俾使我们的大字典，得以陆续补正，有所提高。



上海高校招收词典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 中文系汉语专业决定于1987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辞书专业研究生两名，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炳迢任指导教师。计划开设的基础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语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外文文献检索、外语等；专业课程：辞书学理论、中外辞书编纂史、辞书编纂法等。除上述课程外，还将从事一定的辞书编纂实践活动。（双人）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具书编纂研究室设立了词典学专业，自1986年起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这个专业由上海社联主席、上师大古籍所兼职教授罗竹风和上师大古籍所副所长、副教授杨金鼎担任指导教师，并邀请了宋原放、胡道静、杨祖希等专家学者深袂执教。该专业学制规定为三年，采取学分制，设有词典学、词汇学、训诂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编辑学、国外汉学研究、微机应用、外语等约二十门课程，该专业采用理论与实践、自学与讲授、导师个人指导与研究室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培养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词典学研究人才。

（王礼贤）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

《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 赵振铎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已在1985年10月出版了。第二卷也已发排，第三卷和第四卷的终审工作也告一段落。如果没有重大变故，全书八卷可望在1989年出齐。

这部大型字典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首先是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回顾1975年开始编写的时候，“四害”横行，极“左”思潮泛滥，编写工作受到干扰，某些后遗症长时期没能消除。幸好只过一年，“四人帮”垮台了，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被砸碎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干社会主义，放心大胆地编字典，不再怕戴上“业务挂帅”、“唯生产力论”之类的吓人帽子了。

字典是我国辞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根据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建立起来的。古代汉语单音词众多，这些单音词用方块汉字记录下来就是一个字。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它是一种表意体系的音节文字。它字数众多，形体复杂。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就是为了解说字形结构和意义而编写的。随后，由于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变化，文字的孳乳，旧的字典不能够满足需要，于是陆续出现了《字林》、《玉篇》、《类篇》等字典。清朝初年出版的《康熙字典》已经具备现代字典的规模。本世纪初又出版了《中华大字典》。字典编撰的历史发展过程足以表明字典的编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